

## 論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

何孝榮\*

### 摘要

明憲宗以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而著名。其極度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有：在京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尤其迷戀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即房中術；為藏僧建寺造塔，違制賞賜印信、誥敕等；大量開度藏僧行童，縱容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明憲宗為什麼崇奉藏傳佛教？我們分析，藏傳佛教宣揚「即身成佛」是重要原因；藏傳佛教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的修行方法，是另一重要原因；藏傳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寶，是憲宗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宮廷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有一定影響；憲宗沉溺方術、喜好房中術的個人性格不可忽視；成化年間朝政日趨黑暗腐朽、大臣們對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行為漸失諫諍和約束也有很大關係。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給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帶來了很大影響。他在京師大量封授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使明朝政治日趨黑暗腐朽。但他以在京藏僧出使藏區，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憲宗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會，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後的財政危機；憲宗崇奉藏傳佛教，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加強了漢藏文化交流；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影響及於後朝，孝宗崇奉藏傳佛教與此有一定關係。

---

\*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關鍵詞：**

明憲宗、藏傳佛教、藏僧、法事、寺院、度僧

## 論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何孝榮\*

- 一、前言
  - 二、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
  - 三、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
  - 四、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影響
  - 五、結語
- 

### 一、前言

在明代皇帝中，憲宗朱見深（1464—1487 年在位）以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而著名。<sup>1</sup>明憲宗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為明代僅次於武宗的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皇帝。

迄今為止，關於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尚未見有專著、專文論述。前輩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曾撰文通論明代各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的情況，對憲宗有所涉及，但比較簡單疏略。<sup>2</sup>本文試圖全面而深入地考察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分析其原因，探究其對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

\*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sup>1</sup> 沈德符撰（明），《萬曆野獲編》，卷 27〈僧道異恩〉（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684。

<sup>2</sup> 關於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龍池清著，〈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團〉，載於日本《佛教研究》第 4 卷第 6 號（東京：佛教研究會，1941 年），頁 65—76。佐藤長著，〈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いて〉，載於日本《鷹陵史學》第 8 號（京都：佛教大學歷史研究所，1982 年），頁 109—138。二文。這些論文，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師封授和供養藏僧的情況，而對他們崇奉藏傳佛教的其他表現則多未論述，對他們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影響也缺少探討。

## 二、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

明朝天順八年（1464）正月十七日，通過「奪門之變」而復辟的明英宗朱祁鎮在重登大寶八年後去世。二十二日，十六歲的皇太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憲宗。明憲宗在位期間，極度崇奉藏傳佛教，有諸多表現：

第一，在京大量封授、供養藏僧。

我們知道，明代從太祖開始，在藏區「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乃遣使廣行招諭」，<sup>3</sup>大力封授藏傳佛教各派首領和人士，使其代表明朝政府統治和管理藏區。不過，在藏區基於「多封眾建」政策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其中政治因素是主要的，而宗教信仰的色彩較少。實際上，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他們在京城封授和供養藏僧（指藏傳佛教僧人，並不限於藏族），並任使其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等。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封授在京藏僧尤其頻繁而眾多，而且職別高，名號全備。其中，法王作為明代藏僧的最高名號，正統以前，各朝都封給藏傳佛教領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區化導弭患。景泰年間，景帝對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先後封班丹割釋為大智法王，<sup>4</sup>沙加為大善法王。<sup>5</sup>天順年間，英宗曾追封已經故去的藏僧智光（漢人）為大通法王。<sup>6</sup>但景帝、英宗對居京藏僧封為法王只是偶一為之，數量也不多。憲宗則不同，他多次封授在京藏僧為法王：

- （1）劄巴堅參，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有法王名號，次年四月封為大悟法王；<sup>7</sup>
- （2）劄實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號」，九年七月有銜大應法王；<sup>8</sup>
- （3）領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為大濟法王；<sup>9</sup>

<sup>3</sup> 張廷玉等編修（清），《明史》，卷331〈西域傳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572。

<sup>4</sup> 《明英宗實錄》，卷222，景泰三年十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本，1983年），頁4811。下引明代歷朝實錄同此版本。

<sup>5</sup> 《明英宗實錄》，卷268，景泰七年七月辛巳，頁5683。

<sup>6</sup> 《明英宗實錄》，卷312，天順四年二月庚申，頁6548。

<sup>7</sup> 《明憲宗實錄》，卷49、卷53，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頁1001、1077。

<sup>8</sup> 《明憲宗實錄》，卷58、卷11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頁1178、2272。

<sup>9</sup> 《明憲宗實錄》，卷222，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頁3829。

- (4) 劄實藏卜，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封爲法王；
- (5) 劄實堅剌，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爲法王；
- (6) 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爲法王；
- (7) 鎖南堅參，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爲法王；
- (8) 結幹領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爲法王，<sup>10</sup>《帝京景物略》稱其爲「大興法王」；<sup>11</sup>
- (9) 捨刺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爲法王；
- (10) 著乚領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爲法王；
- (11) 朵兒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爲法王；<sup>12</sup>
- (12) 端竹領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爲大敏法王；<sup>13</sup>
- (13) 卜刺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爲法王。<sup>14</sup>

總計成化年間封授的法王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十三位，<sup>15</sup>遠多於其他各朝（正德年間封授藏僧爲法王八位，連同武宗自封大慶法王，共九位）。至於憲宗封授藏僧以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講經、覺義、都綱等名號，則更爲頻繁，成化後期往往一月數次，封授的人數也更多，常常一次數人至數十人。我們根據《明憲宗實錄》各卷的記載，製成《成化年間封授在京藏僧統計表》如下：

<sup>10</sup> 按，明憲宗同時封劄實藏卜、劄實堅剌、乳奴班丹、鎖南堅參、結幹領占五人爲法王，見《明憲宗實錄》，卷 258，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頁 4353。

<sup>11</sup> 劉侗、于奕正撰（明），《帝京景物略》，卷 5〈西域雙林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頁 206。按，《帝京景物略》將「結幹領占」誤爲「結幹領占」。

<sup>12</sup> 按，憲宗同時封捨刺星吉、著乚領占、朵兒只巴三人爲法王，見《明憲宗實錄》，卷 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頁 4788。

<sup>13</sup> 《明憲宗實錄》，卷 284，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頁 4812；李迪等纂修（清），雍正《甘肅通志》，卷 41〈仙釋方伎·（瑞）[端]竹領占〉，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8 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版），頁 486。按，該僧法王名號「大敏」，實錄無載，茲據雍正《甘肅通志》而補。

<sup>14</sup> 《明憲宗實錄》，卷 284，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頁 4814。

<sup>15</sup> 按，佐藤長著（日本），〈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いて〉，載於日本《鷹陵史學》第 8 號，一文盡列明代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間列舉十一位，遺漏了劄實藏卜、捨刺星吉。

成化年間封授在京藏僧統計表

時間	封 授 藏 僧 情 況	資料出處
三年 十二月 辛丑	番僧法王劄巴堅參、西天佛子劄實巴、國師鎖南堅參、端竹也失、禪師班竹星吉、禮奴班丹以陞職奏乞誥敕、印章，與之	卷49， 第1001頁
四年 四月 辛丑	復以番僧都綱堅察列為佑善衍教國師，賜誥命	卷53， 第1072頁
四年 四月 庚戌	封西僧劄巴堅參為……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劄實巴為……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為靜修弘善國師，端竹也失為淨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	卷53， 第1077頁
四年 九月 己巳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	卷58， 第1178頁
六年 七月 癸巳	先是，六年四月乙丑，西番國師都綱刺麻班著爾藏卜等使靈藏封贊善王還，各貢馬。至是，命造鍍金銀印，給賜大慈恩寺妙勝惠濟灌頂國師班著爾藏卜	卷78、81， 第1516、1585頁
七年 七月 丙申	以番僧怕[帕]思巴領占巴藏卜襲大國師，賜誥敕	卷93， 第1795頁
八年 九月 庚戌	陞番僧也舍堅察崇教廣化國師	卷108， 第2106頁
九年春 正月 庚戌	賜大慈恩等寺法王劄實巴、灌頂大國師端竹也失、班著爾藏卜、國師乳奴班丹、加納失哩誥敕、金印等物	卷112， 第2174頁
十年 二月	陞覺義領占竹為灌頂大國師，劄實藏卜為灌頂國師，都綱劄實堅判為國師	卷125， 第2396頁

癸未		
十年 十二月 丙午	賜大慈恩寺佛子端竹也失、都綱者著堅參等誥敕及印，從所請也	卷136， 第2564 頁
十二年 十一月 癸卯	太監黃賜傳奉聖旨：大隆善護國寺灌頂清心戒行國師班卓兒藏（卜）陞灌頂大國師，大能仁寺覺義結瓦領占陞禪師，鎖南捨辣陞右講經	卷159， 第2905 頁
十三年 四月 辛亥	命番僧班卓兒端竹陞灌頂國師，完卜俄些兒堅剎襲兄領占端竹國師	卷165， 第2991 頁
十三年 十一月 壬午	大慈恩寺佛子領占竹等奏乞印信，事下禮部，以大學士商輅等奏准番僧授職不係本土管事者不予印信事例具聞，上命與之	卷172， 第3109 頁
十四年 三月 甲申	賜……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等誥敕	卷176， 第3182 頁
十四年 六月 丁未	大慈恩寺禪師喃渴領占等乞給銀印。禮部言：先以大學士商輅奏准，番僧受職，不係本土管事者，不與印信。未敢擅擬。有旨與之	卷179， 第3224 頁
十五年 九月 庚辰	太監李榮傳奉聖旨：陞禪師結幹領占為國師	卷194， 第3431 頁
十五年 閏十月 丙子	太監李榮傳奉聖旨：……陞大慈恩寺國師乳奴班丹為灌頂大國師，覺義綽吉堅參為國師，大隆善護國寺灌頂大國師班卓兒藏卜為佛子，國師著乣領占為灌頂大國師	卷196， 第3458 頁
十五年 十一月 辛卯	命番僧桑兒結襲國師	卷197， 第3463 頁

十五年 十二月 戊午	西天佛子並灌頂大國師等官班卓兒藏卜等俱乞金銀印，禮部言：番僧不係本土管事者，例不給。從之	卷198， 第3477—3478頁
十五年 十二月 壬申	太監李榮傳奉聖旨：陞大能仁寺右講經劄巴宗奈為國師	卷198， 第3484頁
十七年 五月 庚子	陞大能仁寺灌頂國師結幹領占為灌頂大國師	卷215， 第3740頁
十七年 十二月 戊申	太監李榮傳奉聖旨：陞大隆善護國寺禪師劄石竹為國師，刺麻班卓劄失右覺義，鎖南倫竹都綱……	卷222， 第3825頁
十七年 十二月 壬戌	賜番僧……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占竹等十四人誥命	卷222， 第3829頁
十八年 九月 丁酉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灌頂國師著乩領占為灌頂大國師，覺義達哩麻悉提為講經，都綱班麻劄失、端竹劄失為覺義，刺麻公葛巴鎖南巴、三竹領占、公葛汪秀領占巴俱為都綱	卷232， 第3957頁
十八年 十一月 甲辰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慈恩寺灌頂大國師劄失堅剌、乳奴班丹俱陞西天佛子，賜誥命、衣帽等物	卷234， 第3979頁
十八年 十二月 壬辰	陞刺麻鎖南[堅]剌為國師。十九年正月辛酉，賜大隆善護國寺國師鎖南堅剌誥命	卷235、236，第 4013、4022頁
十九年 正月 辛酉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大能仁寺灌頂大國師結幹領占為佛子	卷236， 第4022頁
二十年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真覺寺講經答兒馬悉提國師，	卷256，



九月 丙戌	刺麻麻尼星、曷納悉提俱都綱	第4319 頁
二十年 十一月 丙戌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大慈恩寺西天佛子劄實藏卜、劄失堅剌、乳奴班丹，大能仁寺西天佛子鎖南堅參、結幹領占俱為法王，大隆善護國寺灌頂大國師著乩領占、朵兒只巴西天大佛子，大慈恩寺國師綽吉堅參灌頂大國師，國師堅剌星吉灌頂國師，禪師班麻朵兒只、劄失班卓爾、講經真巴捺念俱國師，講經領占巴刺赤羅竹、覺義劄巴遠丹、答兒麻三加竹俱禪師，都綱領占班卓爾覺義，刺麻鎖南領占、鎖南陸竹、昨巴領占、乳奴也失、喃渴陸竹、乳奴短竹、乳奴班丹、昨巴短竹、三加朵兒只、領占陸竹、劄失倫竹、班丹堅剌、倫竹藏卜、領占藏卜、班丹陸竹、展羊領占、鎖南劄失、陸竹劄巴、朵兒只官著巴、奔聶悉幹、劄失遠丹、乳奴堅剌、遠丹劄失俱都綱，大隆善護國寺刺麻端竹羅卓、覺義僧戒增左覺義，大能仁寺覺義領占竹講經，都綱鎖巴列、公葛拴刺、結思念俱覺義，覺義鎖南加劄巴藏播禪師，鎖南耶舍講經，都綱鎖南班丹、覺義僧本隆右覺義，香盤寺都綱綽吉領占覺義，刺麻領占劄失都綱	卷258， 第4353 頁
二十一年 五月 壬戌	賜西僧……西天佛子大國師捨刺星吉、淨修廣善灌頂大國師喃（喝）[渴]領占等八人誥敕	卷266， 第4503 頁
二十一年 十二月 己亥	以番僧班丹汪等三十五人為西天佛子、國師、禪師、講經、覺義、都綱等職	卷273， 第4605—4606 頁
二十一年 十二月	以番僧堅剌星吉等五人為灌頂大國師、國師	卷273， 第4608 頁

乙巳		
二十二年 三月 庚戌	太監韋泰傳奉聖旨：大隆善護國寺禪師班麻扎失陞灌頂大國師，覺義端竹羅卓陞禪師，刺麻竹麻扎失、星吉班丹、汪秀堅判俱陞都綱	卷276， 第4644—4645 頁
二十二年 四月 戊寅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大能仁寺灌頂大國師劄巴藏播陞佛子，國師鎖南加陞灌頂國師，講經鎖南班丹陞禪師，刺麻鎖南朵只領占、窩些領占、寧播盆判巴俱陞都綱	卷277， 第4664 頁
二十二年 十月 癸酉	太監韋泰傳奉聖旨：陞灌頂大國師釋迦啞而塔為西天佛子，禪師津答室哩為國師，刺麻麻的室哩為覺義，國師刺瓦扎為大國師	卷283， 第4785 頁
二十二年 十月 庚辰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捨刺星吉、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著乩領占、朵而只巴為法王	卷283，第4788 頁
二十二年 十月 壬午	太監韋泰……又傳奉聖旨：陞大慈恩寺講經領占孫卜、覺義領占綽為灌頂大國師，講經囉納發刺、戒師公葛朵兒只為國師	卷283， 第4789 頁
二十二年 十月 戊戌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灌頂大國師班麻扎失為佛子，灌頂國師答兒麻悉提、大崇教寺兼住禪師綽藏領占為灌頂大國師，禪師端竹扎失、端竹羅卓為國師	卷283， 第4798 頁
二十二年 十月 己亥	太監韋寧傳奉聖旨：陞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喃渴領占、星吉藏卜為西天佛子，禪師參加班丹、星吉扎失、都綱南渴扎失、鎖南藏卜、覺義拾刺扎失為國師	卷283， 第4798—4799 頁
二十二年 十一月 丙午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大能仁寺灌頂國師鎖南加、講經領占竹為灌頂大國師，覺義公葛捨刺、都綱結敦領占為禪師，刺麻羅丹扎失、倫竹堅參、沙加鎖南、領占堅判、公葛扎失、羅竹堅參、公葛領占、	卷284， 第4802 頁

	你麻堅參、公葛綽、乳奴班丹、領占扎扎失、朵只領占綽、捨刺劄失、鎖南倫卜、領占汪秀、參竹堅參、劄實遠丹、鎖南巴藏藏卜領占、藏卜捨刺為都綱	
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	太監覃昌傳奉聖旨：陞大能仁寺禪師公葛堅參為灌頂大國師，都綱桑加星吉、謹敦堅剏為國師，刺麻端竹堅剏、星吉藏卜、參丹劄失為禪師	卷284， 第4803—4804 頁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	太監韋泰傳奉聖旨：追封已故西天佛子端竹領占為法王，賜祭一壇；陞烏思藏薩嘉寺完卜鎖南堅剏為灌頂大國師，大能仁寺覺義鎖巴列、都綱劄失堅參、領占巴堅剏扎失、公葛端竹為禪師，刺麻那卜堅參、掌出班丹、扎失班丹、扎失倫竹、遠丹宗奈、捨刺羅竹、班丹端竹、扎巴藏卜、結列扎失、班丹堅參、班丹扎失、端竹扎失、喃渴鎖南藏卜、短竹遠丹藏播、朵而只巴藏卜、扎失桑加遠丹為都綱	卷284， 第4812—4813 頁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	太監韋泰傳奉聖旨：陞西天佛子卜刺加為法王，國師班丹端竹為灌頂大國師，講經捨刺扎為國師，都綱也失巴公葛星卜、端竹班著而為禪師，刺麻南渴藏卜、班麻星吉、端竹捨刺、官著領占、展羊端竹、鎖南窩子而、土巴領占為都綱	卷284， 第4814 頁
二十三年二月丙子	太監韋泰傳奉聖旨：……大能仁寺都綱奔聶幹塔為覺義	卷287， 第4847 頁
二十三年五月庚戌	賜西僧……西天佛子大國師刺瓦劄等十二人誥敕	卷290， 第4900 頁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明憲宗實錄》記載不清、不全，因此上表所錄並非成化年間封授在京藏僧的全部，肯定還有遺漏。

對京中藏僧，憲宗皆厚加供養。史稱，劄巴堅參等「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杖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避路」，「日給大官酒饌牲醢至再，錦衣玉食者幾千人」。<sup>16</sup>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因京師供養藏僧過多，光祿寺竟「廩餼、膳夫供應不足」，憲宗才下令「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番僧供給俱省其半」。<sup>17</sup>

憲宗在京城封授和供養的藏僧數量，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稱，「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護國三寺番僧千餘，法王七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sup>18</sup>憲宗去世後，禮部再次統計，「傳陞大慈恩等寺法王、佛子、國師等職四百三十七人，及刺麻人等共七百八十九人」，<sup>19</sup>合計一千二百二十六人。

第二，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迷戀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

明憲宗之所以在京城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是因為他極度崇奉藏傳佛教，任使藏僧在京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等。

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在宮中設立了由宦官充扮藏僧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的番經廠。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廠中「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sup>20</sup>所謂「番經」，就是藏傳佛教經典，「番經來自烏斯藏，即今喇嘛教，達摩目為旁支曲竇者也」。<sup>21</sup>番經廠作為宮中的准藏傳佛教寺院，各朝皇帝經常在其中「做好事」，即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屆時「懸掛幡榜」，「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腰，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sup>22</sup>

除了宦官們在番經廠的藏傳佛教法事，憲宗還經常召請藏僧入宮，誦經行法。早在即位初，憲宗就招藏僧「入內誦經，至晚乃出」。<sup>23</sup>後因首輔李賢的勸

<sup>16</sup> 《明憲宗實錄》，卷 53，成化四年四月庚戌，頁 1077。

<sup>17</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2—4394。

<sup>18</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2。

<sup>19</sup> 《明孝宗實錄》，卷 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頁 56。

<sup>20</sup> 劉若愚撰（明），《酌中志》，卷 16〈內府衙門職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118。

<sup>21</sup> 張居正撰（明），《番經廠記》，見于敏中等編修（清），《日下舊聞考》，卷 39〈皇城·番經廠〉（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617。

<sup>22</sup> 《酌中志》，卷 16〈內府衙門職掌〉，頁 119。

<sup>23</sup> 《萬曆野獲編》，卷 27〈主上崇異教〉（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版），頁 683。

諫，憲宗暫止招請。李賢去世後，憲宗故態復發。成化二年十一月，他賜弘善妙慈灌頂大國師劄實巴誥命。<sup>24</sup>三年十二月，他又封藏僧劄巴堅參、劄實巴等爲法王、西天佛子等（詳見附表《成化年間封授在京藏僧統計表》）。這些藏僧之所以「得倖」，就是因爲他們經常應召入宮誦經行法等，適應和滿足了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需要。對此，《明憲宗實錄》解釋說，劄巴堅參、劄實巴等「以秘密教得倖」，「每召入大內，誦經咒，撒花米，贊吉祥，賜予駢蕃」。<sup>25</sup>其後，憲宗大量封授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成化四年（1467）九月，有言官疏稱，「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生、愍之辰，輒費無限之資財，建無益之齋醮」。<sup>26</sup>成化七年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又批評憲宗「頗留意佛事者」。<sup>27</sup>成化十二年二月，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尹旻等又上疏說：「朝廷齋醮各以時節，僧則大興隆等寺，道則朝天等宮，各有一定之所。近禁中不時齋醮」。<sup>28</sup>成化後期，憲宗任使藏僧舉辦藏傳佛教法事更甚，藏僧領占竹、劄巴堅參等「斫骷髏以爲法碗，行淨至宮，穿朽骨而作念珠，登壇授戒，遂使術誤金丹，氣傷龍脈，一時寢廟不寧，旬日宮車晏駕」，<sup>29</sup>甚至憲宗之死都與之有關。

憲宗尤其迷戀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倖，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sup>30</sup>所謂「秘密教」，據萬曆時人沈德符說，就是流行於元代宮廷的「演揲兒法」即房中術，「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聖主」。<sup>31</sup>

第三，爲藏僧建寺造塔，違制賞賜印信、誥敕等。

成化年間，憲宗不斷爲崇信藏僧修建寺院。成化初年，憲宗曾爲藏僧阿吒哩建西山塔院。至成化四年四月，因禮部尚書姚夔之諫，憲宗「罷修西山塔院，遣番僧阿吒哩乘傳回本土」。<sup>32</sup>對此，《明史》也記載說：姚夔「乞罷西山新建塔

<sup>24</sup> 《明憲宗實錄》，卷 36，成化二年十一月癸巳，頁 718。

<sup>25</sup> 《明憲宗實錄》，卷 53，成化四年四月庚戌，頁 1077。

<sup>26</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78。

<sup>27</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辰，頁 1893。

<sup>28</sup> 《明憲宗實錄》，卷 150，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頁 2749。

<sup>29</sup> 《明孝宗實錄》，卷 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頁 28。

<sup>30</sup> 《明史》，卷 331〈西域傳三〉，頁 8578。

<sup>31</sup> 沈德符撰（明），《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4〈劄巴堅參〉（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版），頁 916。

<sup>32</sup> 《明憲宗實錄》，卷 53，成化四年四月己酉，頁 1076。

院，斥遠阿吒哩之徒」。<sup>33</sup>

但其後，憲宗並未停止為崇信藏僧修建寺院。成化七年十二月，左春坊左諭德王一夔批評說：「臣惟京師連年創建寺宇不絕，報國寺之工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sup>34</sup>這裏所謂的報國寺，是憲宗為其出家的舅舅周吉祥所重建，成於成化二年（1466）五月，賜名大慈仁寺，<sup>35</sup>與本文關係不大。而崇國寺始建於元代，明宣德年間重建，賜名大隆善寺，「而人猶舊稱（崇國寺）」，<sup>36</sup>是當時京城藏僧聚集的四大寺（大慈恩寺、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寶慶寺）之一。<sup>37</sup>該寺「於天順年間傾頹」，憲宗「念佛地，乃出帑金，募財結緣，以成勝事。命太監二員黃順、覃勤，謹率監督內官杜堅等十三員及侍郎等官蒯祥等各色巧匠千數餘人，自成化七年九月初八日興工，次年十一月初二日畢工」。<sup>38</sup>該寺重新修建後，「加額曰護國」，稱大隆善護國寺，<sup>39</sup>與大慈恩寺、大能仁寺並稱成化年間藏僧聚集的京城三大寺。

成化九年，憲宗又修真覺寺。真覺寺是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為來華的印度密僧大善大國師實哩沙哩卜得囉修建的塔院。<sup>40</sup>但該寺在明初建設未備，憲宗「念善果未完，必欲新之，命工督修殿宇，創金剛寶座，以石為之，基高數丈，上有五佛，分為五塔，其丈尺規矩與中印土之寶座無以異也」。<sup>41</sup>

<sup>33</sup> 《明史》，卷 177〈姚夔傳〉，頁 4715。

<sup>34</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頁 1916。

<sup>35</sup> 明憲宗撰（明），〈御制大慈仁寺碑〉，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54。

<sup>36</sup> 談遷撰（清），《北遊錄紀郵上》（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78。

<sup>37</sup> 《明英宗實錄》，卷 17，正統元年五月丁丑，頁 334。

<sup>38</sup> 明憲宗撰（明），〈護國寺題名碑陰記文〉，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97。

<sup>39</sup> 佚名撰（明），〈護國寺碑〉、〈護國寺題名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95、96。

<sup>40</sup> 釋明河纂（明），《補續高僧傳》，卷 25〈大善國師傳〉，收錄於《高僧傳合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頁 760；釋鎮澄編纂（明），《清涼山志》，卷 2〈伽藍勝概·大圓照寺〉（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版），頁 69；儲大文等編纂（清），雍正《山西通志》，卷 171〈寺觀四·大圓照寺〉，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8 冊，頁 304—305。按，關於真覺寺的修建及印度密僧實哩沙哩卜得囉，北京各種史志及當今有關北京佛教和寺院的著述乃至五塔寺（原真覺寺）的各種介紹文字多持誤說。參閱拙文：〈印僧實哩沙哩卜得囉與真覺寺修建考〉，待刊。

<sup>41</sup> 明憲宗撰（明），〈御制真覺寺金剛寶座記略〉，見《日下舊聞考》，卷 77〈國朝苑囿〉，頁 1290—1291。

成化十九年二月，憲宗命襄城侯李瑾「統軍夫萬人修大慈恩寺」。<sup>42</sup>大慈恩寺原名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改今名」，<sup>43</sup>是明代京師藏僧所聚居的首刹。成化年間先後封授的十三位法王中，除劄巴堅參、端竹領占、卜刺加所居寺院不詳以外，劄實巴、領占竹、劄實藏卜、劄失堅剌、乳奴班丹、捨刺星吉等六位法王均居於大慈恩寺，可見其地位重要。二月，憲宗令「給修大慈恩寺官軍一萬人月米三斗、鹽一斤」。<sup>44</sup>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工作繁巨，歷時八個月，至該年九月才完工。<sup>45</sup>

司設監太監王助在西直門外建寺，憲宗賜名興教。成化二十一年（1485）六月，王助死後，憲宗將興教寺賜給原居大能仁寺的大興法王結幹領占，為「焚修之所」。<sup>46</sup>

遇崇信藏僧死，憲宗多為造塔。如，成化七年四月，灌頂大國師鎖南領占死，憲宗「命工部建塔葬之」。<sup>47</sup>成化十年三月，大應法王劄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例葬之」。為了造塔，憲宗「命撥官軍四千供役」。<sup>48</sup>成化十七年十月，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班卓兒藏卜死，憲宗「命摘官軍一千五百為建塔治葬」。<sup>49</sup>

在京藏僧無地土可轄、政務可理，按制無印章之頒給。憲宗崇信藏僧，往往違制給賜。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學士商輅等奏准，「番僧受職，不係本土管事者，不與印信」。<sup>50</sup>但次年十一月，大慈恩寺佛子領占竹等「奏乞印信」，禮部以商輅等奏准事例具聞，憲宗卻「命與之」。<sup>51</sup>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禪師喃渴領占等乞給銀印。禮部「未敢擅擬」，憲宗又「有旨與之」。<sup>52</sup>只是成化十五年十

<sup>42</sup> 《明憲宗實錄》，卷 237，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頁 4025。

<sup>43</sup> 李賢等編修（明），《大明一統志》，卷 1〈京師順天府·寺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2 冊，頁 21。

<sup>44</sup> 《明憲宗實錄》，卷 237，成化十九年二月辛卯，頁 4033。

<sup>45</sup> 王恕撰（明），《王端毅奏議》，卷 12〈議修蘆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27 冊，頁 653。

<sup>46</sup> 明憲宗撰（明），〈興教寺成化敕旨碑〉，見《日下舊聞考》，卷 97〈郊坰〉，頁 1622。

<sup>47</sup> 《明憲宗實錄》，卷 90，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頁 1746。

<sup>48</sup> 《明憲宗實錄》，卷 126，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庚戌，頁 2406、2411。

<sup>49</sup> 《明憲宗實錄》，卷 220，成化十七年十月戊辰，頁 3811。

<sup>50</sup> 《明憲宗實錄》，卷 179、卷 155，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頁 3224、2831。

<sup>51</sup> 《明憲宗實錄》，卷 172，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壬午，頁 3109。

<sup>52</sup> 《明憲宗實錄》，卷 179，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頁 3224。

二月，西天佛子班卓兒藏卜等「俱乞金銀印」，憲宗才從禮部之言「不給」。<sup>53</sup>但這僅是個特例，因為其後「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sup>54</sup>

誥敕作為國家的表彰文書，明初規定頒發給三年考核優秀的文武官員，以示獎勸，<sup>55</sup>而僧官、藏僧並不在列。<sup>56</sup>正統初年，「詔文武臣誥敕非九年不給」。時任吏部主事的李賢提出，誥敕「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以勸臣下」。<sup>57</sup>於是，恢復三年一給誥敕之例。故《明史》記載：「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勅」，「五品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敕命」。<sup>58</sup>憲宗崇信藏僧，頻繁而大量地封授藏僧，而一旦封授，往往違制賜給誥敕。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禮部要求，「自今（際）[除]邊境並外番及在京國師、禪師重職外，餘在京覺義、都綱等職俱不得妄請，庶名器重而事不繁」。憲宗「從之」，<sup>59</sup>對藏僧覺義以下不再賞賜誥敕，而法王、西天佛子、國師、禪師等賞賜如故。

此外，憲宗還給藏僧賞賜佃戶、土地等，免除藏僧寺田賦稅。成化四年正月，藏僧劄實巴「奏乞以宛平縣民十戶為佃戶，並靜海縣樹深莊地一段為常住田」。憲宗「詔許之，不為例」。<sup>60</sup>但後來由於官員們的反對，以及劄實巴所乞土地「皆民間地」，憲宗才下令「追回」。<sup>61</sup>他將興教寺及所屬寺田一頃五十八畝五分賞賜給大興法王結幹領占，「該征糧草悉令有司除豁，仍與寺管業」，<sup>62</sup>以充供贍。

第四，大量開度藏僧行童，縱容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

由於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或邊境其他少數民族人員相隨來京，為行童

<sup>53</sup> 《明憲宗實錄》，卷 198，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頁 3477—3478。

<sup>54</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2。

<sup>55</sup> 正統二年七月丁未條：「行在僧錄司番、漢僧官左講經帖納室哩等十七人，援文臣例請給敕命，行在吏部為之言。上以褒獎賢勞之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見《明英宗實錄》，卷 32，頁 634。

<sup>56</sup> 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條：「禮部奏：在京番僧既無化導番人之功，且有漢人冒充之弊，一授之職，輒請誥敕，殊與京官必待三年考稱乃給，及僧錄司官不給敕命例不同，實濫恩典」。見《明憲宗實錄》，卷 226，頁 3875。

<sup>57</sup> 《明史》，卷 176〈李賢傳〉，頁 4673。

<sup>58</sup> 《明史》，卷 72〈職官志一〉，頁 1736。

<sup>59</sup> 《明憲宗實錄》，卷 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頁 3875。

<sup>60</sup> 《明憲宗實錄》，卷 50，成化四年正月庚寅，頁 1028—1029。

<sup>61</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83。

<sup>62</sup> 明憲宗撰（明），〈興教寺成化敕旨碑〉，見《日下舊聞考》，卷 97〈郊坰〉，頁 1622。



於各寺。而一些內地漢人，或因信奉藏傳佛教，或因羨慕藏僧榮寵，或見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紛紛投入京中各寺，「從學番教」。<sup>63</sup>明初度僧，皆針對漢傳佛教行童。至正統十四年（1449）四月度僧，規定「行童令背《法華》等經並諸品經咒」，「番僧審通場壇十個」，「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度牒）」，<sup>64</sup>始度藏僧行童。<sup>65</sup>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因此廣度習其教者。成化初年，京師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內地漢人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成化二年（1466）度僧，其中開度藏僧行童達到三千四百名。<sup>66</sup>

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師藏僧過多，「其間有中國之人習為番教，以圖寵貴」。有言官要求查審，「果係番僧，資遣還國。若係中國者，追其成命，使供稅役」。<sup>67</sup>因正逢「星變」，憲宗當時表示，「所言有理，所司即議行之」。<sup>68</sup>但幾天後，當禮部官員要求清理時，卻遭到拒絕，憲宗表示：「番僧在祖宗朝已有之，若一旦遣去，恐失遠人之心。踰制服用，別行禁止」。<sup>69</sup>十月，禮部再次要求「清理番僧及中國人冒充者」。法王劄巴堅參「引永樂年間事例陳請」。於是憲宗改令，「中國人先習番經、有度牒者已之，無度牒者清出，今後中國人不許習番教」。<sup>70</sup>憲宗的姑息縱容，使更多的內地漢人投入藏僧隊伍。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鑒於京師藏僧千餘，「其間又多中國人冒濫為之」，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又一次要求「令給事中、御史核其本出山，番族者聽其去留，冒濫者悉令還俗」。<sup>71</sup>但憲宗仍拒絕清理，只是下令「今後漢人冒為之者，必罪不宥」。<sup>72</sup>由於憲宗一再姑息縱容，禮部也對此習以為常。這年十二月，國師劄

<sup>63</sup> 余子俊撰（明），〈災異陳言事〉，見黃訓編集（明），《名臣經濟錄》，卷 40，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4 冊，頁 199。

<sup>64</sup> 《明英宗實錄》，卷 177，正統十四年四月甲戌，頁 3425。

<sup>65</sup> 參閱何孝榮著，〈論明代的度僧〉，載於《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4 年 2 月），頁 26—37。

<sup>66</sup>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條：「刺麻國師劄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禮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數度之。上命禮部遣官督僧錄司，驗其果係番人者給度，毋容冒濫」。見《明憲宗實錄》，卷 273，頁 4608。

<sup>67</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80。

<sup>68</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83。

<sup>69</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癸酉，頁 1187。

<sup>70</sup> 《明憲宗實錄》，卷 59，成化四年十月庚戌，頁 1210。

<sup>71</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2。

<sup>72</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4。

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禮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數度之」。憲宗卻命「驗其果係番人者給度，毋容冒濫」。<sup>73</sup>

成化年間實行「十年一次給度（僧、道）」，第三次即應在成化二十二年的度僧，因從二十年起各地災荒不斷，賑濟缺糧，邊儲缺餉，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各地多次提前大肆鬻牒度僧，「准作二十二年該度之數」。<sup>74</sup>行童或民人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或者銀兩，便可買得度牒，成為國家承認的合法僧人，而不必經過考試經典、甄別民族歸屬等。總計成化二十二年份所度僧、道，達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人。<sup>75</sup>這其中有多少藏僧，因為史無明文，難以確知，但一定不會少。總的來說，成化年間所度藏僧及漢人習學藏傳佛教、出家為藏僧者，均超過前朝。<sup>76</sup>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明憲宗確實極度崇奉藏傳佛教。雖然與自封為大慶法王、以藏僧自居的明武宗相比，憲宗略遜一籌，但遠過於明朝其他諸帝。

而對漢傳佛教，憲宗則並沒有顯露出太多的熱情，接觸的漢僧極少，漢僧得封授禪師、國師以上者微乎其微。惟湖廣江夏僧繼曉，「以房中術驟貴」，<sup>77</sup>封為通元翊教廣善國師。眾所周知，繼曉並非漢傳佛教的高僧名宿，也未聽說以講經說教見長，其能得到憲宗寵信，並封為國師，是因為進獻了房中術。另有太監夏時之弟道友，「捨俗從釋」，<sup>78</sup>「與其兄夏時中貴創（成壽寺）焉」，<sup>79</sup>憲宗「詔封翊教禪師，敕住此寺」。<sup>80</sup>道友的其他事蹟不詳，不知其為藏僧還是漢僧，他的受封主要是因為夏時的關係。可見，明憲宗雖然號稱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但他極度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

<sup>73</sup> 《明憲宗實錄》，卷 273，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頁 4608。

<sup>74</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8、卷 269，成化二十一年七月辛亥、八月辛卯，頁 4526、4547。

<sup>75</sup> 倪岳撰（明），《青谿漫稿》，卷 13〈止給度疏〉，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1 冊，頁 150。

<sup>76</sup> 參閱何孝榮著，〈論明代的度僧〉，載於《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

<sup>77</sup> 《萬曆野獲編》，卷 21〈秘方見倖〉，頁 547。

<sup>78</sup> 佚名撰（明），〈夏時墓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09。

<sup>79</sup> 胡繼升撰（明），〈重修成壽寺記〉，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九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57。

<sup>80</sup> 《日下舊聞考》，卷 45〈內城東城一〉，頁 707。按，上引（明）胡繼升：〈重修成壽寺記〉碑稱道友為「成化禪者」。

### 三、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

明憲宗為什麼崇奉藏傳佛教？我們結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及修持特點，以及明朝宮廷中的藏傳佛教信仰傳統、憲宗的個人性格、成化年間的朝政等，試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傳佛教宣揚「即身成佛」是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重要原因。藏傳佛教形成於十世紀後半期至十三世紀的後弘期，有許多教派。儘管他們在傳承與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別，但「信仰的教義內容則是一致的，都屬於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sup>81</sup>大乘空宗（顯宗）的教義，大體上就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創教學說，如四聖諦說、因緣說、業力說、無常說、無我說等，與漢傳佛教基本一致。藏傳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內容和鮮明特色。其教義認為，世界萬物、佛和眾生皆由地、水、火、風、空、識「六大」所造。前「五大」為「色法」，屬胎藏界，「識」為「心法」，屬金剛界。色、心不二，金、胎為一，兩者賅宇宙萬有，而又皆具眾生心中。佛與眾生體性相同，本無差別。眾生根據宗教導師（喇嘛）的秘密傳授，通過設壇、供養、誦咒、灌頂等種種儀式，嚴格依法修行，身結印契（「身密」），口誦真言（「語密」），意觀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業」清淨，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與眾生三密相應，融和無間，此身即可成佛。

與顯宗（除禪宗以外）的須經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始得證佛果相比，密宗的僅修三密妙行即可現生成佛更為簡易快速。<sup>82</sup>這也是藏傳佛教吸引民眾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憲宗封授、崇信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無不反映他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接受，對即身成佛觀念的信持。

第二，藏傳佛教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於記載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屬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過，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是藏傳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點，這對最高統治者來說，不僅神秘而新奇，更可為其奢侈荒淫生活帶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頗具吸引力。藏傳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

<sup>81</sup> 丁漢儒、溫華等著，《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頁126。

<sup>82</sup> 參閱《佛光大辭典》（新版、電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條。

彩」，通過「侈設儀式，講究修法，演習咒術等」，<sup>83</sup>廣作法事，據說可以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術，擅長咒語和誑話」，<sup>84</sup>作法多著「靈驗」，也對大眾很有吸引力。明憲宗之所以崇奉藏傳佛教，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它們據說能夠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凶。

藏傳佛教密宗各派皆以無上瑜伽部的各種教授為主要修行法門，所謂「以神秘欲樂之道為究竟無上，則西藏各家所共信也」。<sup>85</sup>他們「將般若的‘空’性，配合女性的陰戶；方便的‘有’相，配合男性的陽具」，「以方便為父，以智慧為母，父母相應，便是瑜伽法的福智圓滿；男女雙修，便是悲智雙運」，「男女雙身的擁抱交合，即是無上瑜伽的極則」，「在強烈欲樂的交抱之際，能達成身心的統一，便是無住處涅槃的境界，便是成佛」。<sup>86</sup>這種男女雙修，稱為「秘密教」、「演揲兒法」等，修行此法，有嚴整的儀軌與口訣。它「外眩佛教之名，內實與御女術同」。<sup>87</sup>藏僧精於「秘密教」即房中術，正滿足了明憲宗奢侈荒淫生活的需要。因此，藏學家鄧銳齡先生指出，明憲宗、武宗崇奉藏傳佛教，崇信藏僧，「這同皇帝們沉溺於色欲，妄想從密法學習中得到性的滿足有關」。<sup>88</sup>

第三，藏傳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寶，是明憲宗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傳佛教特別注重師徒傳承，宣揚喇嘛是救度眾生的宗教導師，眾生不依喇嘛的引導，不會知有佛教；不從喇嘛的教誨傳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後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寶。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寶的全部」，「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傳佛教提倡皈依喇嘛，並對喇嘛僧團也絕對皈依崇拜，「須竭盡一切的財物來供奉喇嘛」。<sup>89</sup>明憲宗既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就不能不受其崇拜喇嘛、皈依四寶說教的影響，因此他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

<sup>83</sup> 黃玉生等著，《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4。

<sup>84</sup> 丁漢儒、溫華等著，《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頁133。

<sup>85</sup> 釋印順著，《佛教史地考論》（台北：正聞出版社，2000年），頁86。

<sup>86</sup> 釋聖嚴著，《西藏佛教史》（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130—134。

<sup>87</sup> 釋印順著，《印度之佛教》（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頁323。

<sup>88</sup> 鄧銳齡著，〈明代中央與烏思藏的關係〉，載於《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頁58。

<sup>89</sup> 釋聖嚴著，《西藏佛教史》，頁125—129。

第四，宮廷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也對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產生一定影響。

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洪武年間，太祖授先後來朝的印度密僧板的達撒哈咱失里爲善世禪師，藏僧和林國師朵兒只怯烈失思巴藏卜爲都綱、副禪師，爲全國最高僧官。<sup>90</sup>太祖對撒哈咱失里十分崇信，命於鐘山創庵居之，每「駕幸鐘山，必造師室，咨問法要」。<sup>91</sup>南京雞鳴山下有萬人坑，明初建國子監於其上。但據說其地陰魂不散，妖氣出沒，太祖「思以神道治之」，迎取藏僧惺吉堅藏等七僧來結壇作法，「妖氣始滅」。<sup>92</sup>成祖聽說噶瑪噶舉派黑帽係第五世活佛噶瑪巴卻貝桑布（《明太宗實錄》作「哈立麻」）「道行卓異」，派人往征。噶瑪巴應召到南京後，「日日爲皇帝次第說法」，並被「延請進宮，建立壇城，爲皇帝授無量灌頂」。<sup>93</sup>薩迦派故元帝師後裔貢噶西（《明太宗實錄》作「昆澤思巴」）「有道術」，成祖也派人往征。貢噶西爲成祖「講授諸多佛法」，「傳給吉祥喜金剛壇城深奧成熟灌頂、大黑天護法神加持等諸多深奧之法，使其如願以償」。<sup>94</sup>其後，貢噶西又爲成祖「傳授灌頂和經咒加持、教誡、隨許等諸多佛法傳授，使其心滿意足」。<sup>95</sup>成祖仰慕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先後兩次召請，宗喀巴派弟子釋迦也失代替入朝。據說，釋迦也失用醫藥和傳授灌頂爲成祖治好了重病。<sup>96</sup>仁宗時，加封撒哈咱失里弟子智光爲灌頂廣善大國師。<sup>97</sup>宣宗時，封釋迦也失爲大慈法王。<sup>98</sup>對僧智光，宣宗建大覺寺以居之，「敕禮官度

<sup>90</sup> 《明太祖實錄》，卷 94，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頁 1636。

<sup>91</sup> 釋來復撰（明），〈西天善世禪師班的達公塔銘有序〉，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一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7。

<sup>92</sup> 葛寅亮纂修（明），《金陵梵剎志》卷 17，釋道果〈雞鳴寺施食臺記〉，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30。

<sup>93</sup> 巴俄祖拉陳瓦著，〈賢者喜宴〉，頁 1001—1011。轉引自鄧銳齡著，《〈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尙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載於《中國藏學》1992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1992 年 8 月），頁 84—96。

<sup>94</sup> 阿旺貢嘎索南著，《薩迦世係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31—239。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08。

<sup>95</sup> 阿旺貢嘎索南著，《薩迦世係史》，頁 231—239。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冊，頁 109。

<sup>96</sup> 參閱楊貴明、馬吉祥著，《藏傳佛教高僧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頁 273。

<sup>97</sup> 《明仁宗實錄》，卷 2 下，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頁 65。

<sup>98</sup> 《明宣宗實錄》，卷 111，宣德九年六月庚申，頁 2491。

僧百餘人爲其徒」。<sup>99</sup>其時，京師有「番僧數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sup>100</sup>總計達一千一百餘人。<sup>101</sup>他們的每日酒食，「俱係光祿寺支持，有日支酒饌一次、三次，又支廩餼者，有但支廩餼者」。<sup>102</sup>英宗即位初，對京師藏僧「雖多遣斥，其後加封號者亦不少」。<sup>103</sup>大慈恩等寺分住國師、禪師、喇嘛、阿木葛等計三百四十四人。<sup>104</sup>英宗尊崇國寺楊禪師爲「上師」，以其爲宗教導師，「儀從同於王者」<sup>105</sup>。景帝時，先後封居京藏僧班丹割釋爲大智法王、<sup>106</sup>沙加爲大善法王。<sup>107</sup>對京中藏僧，景帝「命光祿寺照舊日支國師、禪師、僧官、刺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國師加倍」。<sup>108</sup>景帝皈依藏僧道堅，「至召入禁中緝熙殿，親受法」。<sup>109</sup>英宗復辟後，對藏僧復加徵召、封授。其「恩澤」甚至及於已經故去的藏僧，先後追封僧智光爲大通法王、<sup>110</sup>僧端竹領占爲西天佛子。<sup>111</sup>西天佛子鎖南釋刺「日給酒食卓面」，死後，光祿寺「援例終百日停給」。英宗竟以「擅停之罪」，將掌寺事禮部右侍郎蔚能等「下鎮撫司獄鞠之」。<sup>112</sup>僧道堅爲景帝所皈依，英宗復辟後謫戍遼東。天順元年（1457）九月，英宗又將其「召還，復其職」，<sup>113</sup>崇信如故。

明代宮中設立番經廠，作爲准藏傳佛教寺院，宦官接受專門培訓者往往成百上千，經常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宮中英華殿、隆德殿、欽安殿，也是供奉藏

<sup>99</sup> 《補續高僧傳》，卷 1〈明西天國師傳〉，頁 612。

<sup>100</sup> 《明英宗實錄》，卷 17，正統元年五月丁丑，頁 333。

<sup>101</sup> 《明英宗實錄》，卷 17，正統元年五月丁丑，頁 333—334。

<sup>102</sup> 《明英宗實錄》，卷 17，正統元年五月丁丑，頁 333。

<sup>103</sup> 《明史》，卷 331〈西域傳〉三，頁 8577—8578。

<sup>104</sup> 《明英宗實錄》，卷 79，正統六年五月甲寅，頁 1571。按，阿木葛爲薩迦派大乘法王部僧，宣德元年三月封爲「灌頂淨修弘智國師」。（《明宣宗實錄》，卷 15，宣德元年三月庚子，頁 397）

<sup>105</sup> 《明英宗實錄》，卷 183，正統十四年九月戊子，頁 3570。按，「上師」，即喇嘛的意譯，爲藏傳佛教對所謂具有高德勝行、堪爲世人軌範者的尊稱。

<sup>106</sup> 《明英宗實錄》，卷 222，景泰三年十月壬子，頁 4811。

<sup>107</sup> 《明英宗實錄》，卷 268，景泰七年七月辛巳，頁 5683。

<sup>108</sup> 《明英宗實錄》，卷 207，景泰二年八月甲申，頁 4454。

<sup>109</sup> 《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1〈天順初元盛德〉，頁 791。按，原文稱道堅爲「西域僧」，明代「西域」實是對當時藏區的誤稱，《明史》記載藏區史事均列於〈西域傳〉。

<sup>110</sup> 《明英宗實錄》，卷 312，天順四年二月庚申，頁 6548。

<sup>111</sup> 《明英宗實錄》，卷 341，天順六年六月戊寅，頁 6922。

<sup>112</sup> 《明英宗實錄》，卷 319，天順四年九月甲戌朔，頁 6642。

<sup>113</sup> 《明英宗實錄》，卷 282，天順元年九月乙丑，頁 6051。

傳佛教佛像、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的場所<sup>114</sup>。正統年間，「命啓秘密各色壇場」，智光弟子禪牒室哩「掌壇」，「約千餘壇」。天順元年，禪牒室哩受命「教中貴百餘西天壇場，與受灌頂諸戒」<sup>115</sup>。智光另一弟子三曼答室哩也於正統初年「督啓各色壇場，念誦真乘」。天順二年（1458），三曼答室哩又受命「於內府番經廠，管教中貴百餘員，習授西天各佛壇場好事」<sup>116</sup>。在京中各寺，諸帝也令藏僧頻繁舉辦法事。前述禪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壇」、「督啓」的各色壇場，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宮外各寺舉辦的。

從小在宮廷中成長的憲宗，耳聞目睹隨處可見的藏傳佛教佛像及其祖、父輩頻繁舉行的藏傳佛教法事，不時接觸入宮藏僧，並與受過藏傳佛教法事訓練的宦官朝夕相處，不能不受影響。一旦繼位為帝，便會像其祖、父輩一樣，迅速走上崇奉藏傳佛教的老路。

第五，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還與其沉溺方術、喜好房中術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係。

明憲宗在位期間，明朝已經基本渡過了土木之變、奪門之變帶來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動盪，「時際休明」，<sup>117</sup>社會矛盾、民族矛盾以及階級矛盾均有所緩和。身處承平形勢下的明憲宗，政治上缺少了遠大志向和抱負，「默默無聞、無所作爲」。而在個人生活中，明憲宗「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個性的」，<sup>118</sup>因此他崇僧佞道，沉溺方術，追求長生，特別是喜好房中術。<sup>119</sup>適應明憲宗頹廢荒淫生活的需要，不少方士、道士、僧人得到寵信和重用。限於篇幅，這裏僅以憲宗好房中術、各色人等進獻房中術言之。如，襄陽人王臣，拜錦衣千戶，「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sup>120</sup>道士鄧常恩由道錄司右至靈（正八品）傳陞為太常卿（正三品），躋身小九卿之列，「不過以房中術得之」。<sup>121</sup>道士李孜省更是官至禮部右

<sup>114</sup> 《酌中志》，卷 16〈內府衙門職掌〉，頁 119。

<sup>115</sup> （明）釋道深，〈圓寂僧錄左街講經兼弘仁開山掌秘密教禪牒大禪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99。

<sup>116</sup> 釋道深撰（明），〈大明誥封圓修慈濟國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42。

<sup>117</sup> 《明史》，卷 14〈憲宗本紀贊〉，頁 181。

<sup>118</sup> 方志遠著，《成化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頁 378。

<sup>119</sup> 參閱方志遠著，《成化皇帝大傳》，頁 292—329。

<sup>120</sup> 《萬曆野獲編》，卷 27〈二癩子〉，頁 698。

<sup>121</sup> 《萬曆野獲編》，卷 27〈僧道異恩〉，頁 684。

侍郎（正三品），掌通政司事，「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sup>122</sup>僧繼曉累進通玄翊教廣善國師，「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立從」。<sup>123</sup>而他們之所以得寵，實際上「皆以房中術驟貴」。<sup>124</sup>一些大臣、官員甚至也投憲宗所好，通過進獻房中術而保官釣職。如，成化後期，萬安即以首輔之尊進獻房中術。孝宗即位初，「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未署曰：『臣（萬）安進』」。<sup>125</sup>不僅是萬安，據沈德符記載：「萬（安）以媚藥進御，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安），至都御史李實、給事中張善俱獻房中秘方，得從廢籍復官」。<sup>126</sup>明憲宗如此沉溺方術、喜好房中術，也就不難理解其對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藏僧精通房中術的藏傳佛教極度崇奉了。

第六，明憲宗日益崇奉藏傳佛教也與成化年間朝政日趨黑暗腐朽、大臣們對其崇奉藏傳佛教的行為漸失諫諍和約束有很大關係。

成化前期，「朝多耆彥」，<sup>127</sup>大臣多「侃侃守義，盡忠獻納」，<sup>128</sup>不斷地嚴厲勸諫和約束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因此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尚能克制。

憲宗初即位，即崇奉藏傳佛教，招藏僧「入內誦經，至晚乃出」。<sup>129</sup>時李賢以首輔主政，他對憲宗皇位有奠定之功，<sup>130</sup>因此在憲宗面前說話很有分量。李賢以憲宗之舉有違《祖訓》，要求「明禁以嚴宮禁」。憲宗答曰：「《祖訓》敢不祇率」。<sup>131</sup>李賢的勸諫起了作用，其後一時再未見有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記載。

但是，隨著李賢於成化二年（1466）冬去世，憲宗開始恢復崇奉藏傳佛教。成化三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日甚，恣意封僧建寺。對此，禮部尚書姚夔等「耆彥」大臣及言官多次上疏諫諍。如，成化四年四月，姚夔諫止修西山塔院，並遣藏僧阿吒哩乘傳回本土。憲宗賜劄實巴以佃戶、土地，

<sup>122</sup> 《明史》，卷 307〈李孜省傳〉，頁 7882。

<sup>123</sup> 《明史》，卷 307〈繼曉傳〉，頁 7885。

<sup>124</sup> 《萬曆野獲編》，卷 21〈秘方見倖〉，頁 547。

<sup>125</sup> 《明史》，卷 168〈萬安傳〉，頁 4525。

<sup>126</sup> 《萬曆野獲編》，卷 21〈士人無賴〉，頁 541。

<sup>127</sup> 《明史》，卷 14〈憲宗本紀贊〉，頁 181。

<sup>128</sup> 《明史》，卷 176〈彭時、商輅傳贊〉，頁 4696。

<sup>129</sup> 《萬曆野獲編》，卷 27〈主上崇異教〉，頁 683。

<sup>130</sup> 按，據《明史》，卷 176〈李賢傳〉，頁 4676：當英宗病危，「有間東宮（指太子朱見深，引者注）於帝（指英宗，引者注）者，帝頗惑之」，準備更換皇位繼承人。因李賢的堅持，英宗排除疑慮，終決定「傳位太子」。

<sup>131</sup> 《萬曆野獲編》，卷 27〈主上崇異教〉，頁 683。



也因戶部反對而作罷（詳見前文）。四年九月，給事中魏元、監察御史康永韶等先後利用「星變」上言，要求查審、驅遣藏僧，停止厚加供養等。<sup>132</sup>幾天後，姚夔等再次提出，「宜從（魏元、康永韶等）所言施行」。憲宗不得已，表示：「番僧在祖宗朝已有之，若一旦遣去，恐失遠人之心。踰制服用，別行禁止」。<sup>133</sup>雖然沒有查審、驅遣京中藏僧，但還是對踰制供養藏僧等加以禁約。其後，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大學士彭時又因「星變」批評憲宗崇奉藏傳佛教，要求憲宗「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減去內府修齋」；<sup>134</sup>左春坊左諭德王一夔則批評憲宗為藏僧等修建寺院，並責問說：「謂奉佛可以徼福，則梁武往輒可鑒。何必竭府庫有限之財，為此無益之事」？<sup>135</sup>成化十二年二月，禮科都給事中張謙等以「南京災異」，又上疏抨擊「異端太盛，名器太濫，甚者為朽骨造塔院，因病死修齋醮」；<sup>136</sup>英國公張懋等奏稱，「近禁中不時齋醮，恐煩則瀆，宜據禮停罷，惟嚴恭寅畏，以答天心」。<sup>137</sup>這些「耆彥」大臣及言官等無不把憲宗崇奉藏傳佛教視為崇奉「異端」，加以嚴厲批評和抨擊。因此，成化前期，憲宗雖然崇奉藏傳佛教，但表現尚不為烈，無論是封授和供養藏僧，還是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等，都有所克制。

成化前期「朝多耆彥」、「盡忠獻納」的局面維持了十餘年，隨著成化十一年三月大學士彭時去世、十三年六月大學士商輅致仕，此後內閣長期由萬安等把持，排擊正人，加上憲宗任用汪直開西廠，朝中善類被驅斥殆盡，朝政日趨黑暗腐朽。由於失去了正直之臣的諫諍和約束，代以佞倖之臣的阿順和迎合，成化後期，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更甚。

萬安在成化後期為首輔達十年。他「無學術」，「日事請托，結諸閹為內援」。<sup>138</sup>憲宗「失德」，多弊政，萬安與另兩位閣臣劉吉、劉珏「無所規正」，各部尚書也多平庸，時稱「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sup>139</sup>憲宗沉溺方術、好房中術，

<sup>132</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76—1183。

<sup>133</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癸酉，頁 1187。

<sup>134</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辰，頁 1893。

<sup>135</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頁 1916。

<sup>136</sup> 《明憲宗實錄》，卷 150，成化十二年二月戊戌，頁 2742。

<sup>137</sup> 《明憲宗實錄》，卷 150，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頁 2749。

<sup>138</sup> 《明史》，卷〈萬安傳〉，頁 4523。

<sup>139</sup> 《明史》，卷 168〈劉吉傳〉，頁 4528。

崇奉藏傳佛教，萬安等大臣及一些官員不僅不加勸諫，反而極力阿順和迎合（詳見前文）。當時，大臣們所上的涉及勸諫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奏疏寥寥無幾，而且沒有了指斥藏傳佛教為「異端」等內容和嚴厲的態度。如，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學士商輅等因所謂「災變」上《修德弭災疏》。這一奏疏，涉及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時，只是從「節財用」的角度，要求憲宗不再對在京藏僧陞職者頒給印信，「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sup>140</sup>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禮部因在京藏僧授職輒頒給誥敕，建議以後「除邊境並外番及在京國師、禪師重職外，餘在京覺義、都綱等職俱不得妄請」，<sup>141</sup>也是不痛不癢。唯一能夠稱得上批評和約束的，只有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周洪謨等人的奏疏。其中說：

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護國三寺番僧千餘，法王七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廩餼膳夫供應不足。況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用度擬於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人冒濫為之。宜令給事中、御史核其本出山，番族者聽其去留，冒濫者悉令還俗。<sup>142</sup>

這一奏疏中，也不見「異端」等字眼，態度也並不嚴厲。當時，大臣們對憲宗崇奉藏傳佛教只是阿順和迎合。因此，沈德符批評說，成化十七年，道士鄧常恩由右至靈傳陞為太常卿，「時尹恭毅（旻）任太宰（吏部尚書），不能執奏」，同年十二月賜大濟法王領占竹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洪謨）為宗伯（禮部尚書），亦不聞執奏也」。<sup>143</sup>嚴厲的勸諫和批評沒有了，憲宗自然更加崇奉藏傳佛教。

<sup>140</sup> 商輅撰（明），《商文毅疏稿·修德弭災疏》，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27冊，頁444。

<sup>141</sup> 《明憲宗實錄》，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頁3875。

<sup>142</sup> 俞汝楫纂（明），《禮部志稿》，卷47〈星變陳言九事疏〉，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7冊，頁875；《明憲宗實錄》，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4392。

<sup>143</sup> 《萬曆野獲編》，卷27〈僧道異恩〉，頁684。

#### 四、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影響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無疑給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帶來了很大影響。

首先，明憲宗在京師大量封授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使明朝政治日趨黑暗腐朽。但他以在京藏僧出使藏區，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成化時期，朝政日趨黑暗腐朽既是明憲宗日益崇奉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又是它的一個必然結果。憲宗大量封授藏傳佛教僧人，嚴重破壞了官員的選拔和陞用制度，造就了龐大的無補於國計民生的官員隊伍。我們知道，明代選官，主要有科舉、薦舉、學校等幾個途徑。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倖得官，與上述幾途無涉，破壞了正常的官員選拔制度。憲宗封授的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講經、覺義、都綱等各種名號，其中灌頂國師為二品，大國師為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sup>144</sup>法王、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的官品則更高，「由此可以推察喇嘛受優遇的程度」。<sup>145</sup>封建官吏的職責是輔君治民，協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與烏斯藏本土關係不大」，「不具政治內容」，<sup>146</sup>無補於國計民生，時人所謂「無片善寸長可采」，<sup>147</sup>「無化導番人之功」，「實濫恩典」。<sup>148</sup>藏僧的陞授，按制由禮部題奏，皇帝批准。但憲宗往往直接派宦官傳旨封授（傳奉官）。吏部官員得旨後，「則次日依例於御前補奏」。成化後期，「僧、道官傳奉寢盛」，吏部尚書尹旻等「無旬日不赴左順門候接傳奉」。最後連傳旨宦官也嫌煩，「諭令勿復補奏，至廢易舊制而不恤云」。<sup>149</sup>大量封授藏僧，「倖門大開」，「濫汙名器」，<sup>150</sup>使封建政治日益黑暗腐朽。

明憲宗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而對上朝聽政、出

<sup>144</sup> 《明宣宗實錄》，卷 14、卷 15，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頁 380—381、397—398。

<sup>145</sup> 龍池清著（日本），〈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團〉，載於日本《佛教研究》第 4 卷第 6 號。

<sup>146</sup> 伊偉先著，《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頁 217。

<sup>147</sup> 《明憲宗實錄》，卷 77，成化六年三月辛巳，頁 1483。

<sup>148</sup> 《明憲宗實錄》，卷 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頁 3875。

<sup>149</sup> 《明憲宗實錄》，卷 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頁 2905。

<sup>150</sup> 《明孝宗實錄》，卷 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頁 29。

席經筵日講等卻多持消極態度。憲宗「頗留意佛事」，經常召藏僧入內。他迷戀「秘密教」即房中術，荒淫廢政，「十五、六年未嘗與群臣相見」，「廉遠堂高，君門萬里」，「上下否隔，朝政日非」。<sup>151</sup>

當然，明憲宗也曾派一些在京藏僧為使，到藏區傳達朝廷政令，處理一些藏區事務。如，成化三年（1467）二月，「大慈恩寺灌頂淨修弘治（智）國師結列領占蒙遣刺麻著旦領占等烏思藏公幹回，各貢氍毹等物」；<sup>152</sup>六年四月，「西番國師都綱刺麻〔班〕著爾藏卜等使靈藏封贊善王還，各貢馬」；<sup>153</sup>九年七月，「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端竹也失奏：往陝西河州等處治公事，乞以鴻臚寺冠帶通事張志通偕行」，「得旨允之」；<sup>154</sup>十三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綱捨刺藏卜並靜修弘善大國師（鎮）〔鎖〕南堅參等奉命往臨洮等處回，各獻馬、馱等物」。<sup>155</sup>無疑，這些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當時中央與藏區的聯繫主要依靠藏區遣人來京朝貢等，派遣在京藏僧出使藏區者少而又少（《明憲宗實錄》中記載者主要是就上列幾次），且多是由較低職別藏僧擔任。因此，與前述政治上的消極影響相比，這一積極作用頗為有限。

其次，明憲宗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會，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後的財政危機。

明憲宗在京師供養大量藏僧，為他們提供豐厚的酒肉飯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藏僧劄巴堅參、劄實巴等「其所奉養，過於親王」，<sup>156</sup>「儀衛過於王侯，服玩擬於供御，錦衣玉食，徒類數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齒」。<sup>157</sup>除了酒肉飯食，憲宗還為在京藏僧提供相應的人夫以供役使。成化後期，京中供養藏僧達一千二百餘人，「光祿寺日供應下程並月米，及隨從館夫、軍校動以千計」<sup>158</sup>，以致「廩餼、膳夫供應不足」。<sup>159</sup>

<sup>151</sup> 趙翼撰（清），《陔餘叢考》，卷 18〈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年），頁 360—362。

<sup>152</sup> 《明憲宗實錄》，卷 39，成化三年二月壬子，頁 788。

<sup>153</sup> 《明憲宗實錄》，卷 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頁 1516。

<sup>154</sup> 《明憲宗實錄》，卷 118，成化九年七月癸巳，頁 2272。

<sup>155</sup> 《明憲宗實錄》，卷 173，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頁 3123。

<sup>156</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78。

<sup>157</sup> 《明憲宗實錄》，卷 58，成化四年九月己巳，頁 1180。

<sup>158</sup> 《明孝宗實錄》，卷 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頁 56。

<sup>159</sup> 《明憲宗實錄》，卷 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頁 4392。

明憲宗在京中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也花費大量財物。其時，「內府造作及修齋醮、寫經咒，並不時賞賚，費耗甚多」。<sup>160</sup>僅以果品來說。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光祿寺少卿陳鉞反映，「歲時及齋醮等事，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盤，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試以二十桌計之，尺盤合用一千餘斤，桌數、斤數日見加增」。<sup>161</sup>陳鉞說，「且郊祀廟享俱用散撮，何獨修齋乃獨增加？況佛乃夷狄之神，求福求嗣，祈雨祈晴，俱無實效，斷不可信」。<sup>162</sup>也就是說，國家正規而隆重的郊祀廟享大典所用果品，都不如憲宗做佛教法事者多。由於耗費巨大，以致有人說「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騷擾」。<sup>163</sup>

明憲宗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時人說，憲宗「臨御以來，愈興顯密之教，凡建精藍，連薨接棟，比於歷代不侔矣」。<sup>164</sup>「連薨接棟」的「精藍」，每一所都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如，成化七年十二月，左春坊左諭德王一夔說，「京師連年創建寺宇不絕，報國寺之工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所費動數十萬計」。<sup>165</sup>再如，大應法王劄實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於王者，造塔之費，將幾於山陵。而親王之薨，大臣之卒，顧不及焉」。<sup>166</sup>再如，憲宗修理大慈恩寺，動用軍夫萬人，歷時八個月，耗費的人力、財力也可想而知。

眾所周知，明代中期，財政收入大減，支出劇增，「倭寇交訌，仍歲河決，國用耗殫」，<sup>167</sup>國家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其時，邊軍缺餉，賑濟乏糧，國庫匱乏，統治者不得不頻繁地賣官鬻爵、出售度牒等，千方百計籌集錢糧。<sup>168</sup>即使如此，憲宗卻不知體恤，在京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會，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等，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加劇了當時的財政危機。其具體情況，日本學者鈴木正有專門的論文加以論述<sup>169</sup>，可以參看。

<sup>160</sup> 《明憲宗實錄》，卷 150，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頁 2749。

<sup>161</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頁 1904。

<sup>162</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頁 1904。

<sup>163</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辰，頁 1893。

<sup>164</sup> 孫添濟撰（明），〈敕賜廣濟寺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55。

<sup>165</sup> 《明憲宗實錄》，卷 99，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頁 1916。

<sup>166</sup> 《明憲宗實錄》，卷 126，成化十年三月庚戌，頁 2410。

<sup>167</sup> 《明史》，卷 78〈食貨志二·賦役〉，頁 1905。

<sup>168</sup> 參閱何孝榮著，〈論明代的度僧〉，載於《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

<sup>169</sup> 參閱鈴木正著（日本），〈明代帝室財政と仏教〉，載日本《歷史學研究》第 6 卷第 12 號，頁 29—61。

再次，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加強了漢藏文化交流。

關於明代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過去一直為研究明代佛教史者所忽視。其實，由於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因此藏傳佛教一直在北京等內地傳播。成化年間，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因此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頗為盛行。表現為：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等地，錦衣玉食，授徒傳戒，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為藏僧者眾多。對此，前文多有論述，這裏再稍作補充。如，成化八年（1472）去世的藏僧禪師禪牒室哩，其立於京師西竺寺的塔銘碑之陽、陰，共刻有徒子、徒孫藏僧者二十餘人。<sup>170</sup>成化十三年去世的圓修慈濟國師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餘，皆能解悟」。<sup>171</sup>房山縣小西天石經寺，住持為藏僧噶塔悉哩，僧人則為唵喃塔、束塔囉得納。<sup>172</sup>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等地，錦衣玉食，異常活躍。他們授徒傳戒，建寺作法，傳播藏傳佛教。而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為藏僧者眾多，也形成一股風氣。這些，無疑是藏傳佛教在北京傳播和盛行一時的最有力證據。

其二，藏僧在京中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詳見前文）。

其三，京中出現了不少藏傳佛教寺院。除了前述藏僧聚集的大慈恩寺、大隆善寺、大能仁寺、寶慶寺等幾大寺以及真覺寺、興教寺等以外，成化年間，一些藏僧還在京修建寺院。如，成化元年八月，太監劉嘉林以欽賜官宅「願與崇化大應法王（劄實巴）為下院」，「洎法王賢弟子劄失列，會同開山，各捐資材協助」，寺成，憲宗「敕賜曰廣濟寺」，「仍令劄失列領南宮劄文，為第一代住持」。<sup>173</sup>圓修慈濟國師三曼答室哩，「傾囊於京西八十里暘臺山大覺、西竺鄰峰

<sup>170</sup> 釋道深撰（明），〈圓寂僧錄左街講經兼弘仁開山掌秘密教禪牒大禪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99。

<sup>171</sup> 釋道深撰（明），〈大明誥封圓修慈濟禪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42。

<sup>172</sup> 佚名撰（明），〈張普旺造石彌勒像碣〉，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01。

<sup>173</sup> 孫添濟撰（明），〈敕賜廣濟寺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55。按，劄實巴封法王在成化三年十二月，因該碑撰刻於成化十六年五月，故稱成化元年的劄實巴為法王。

創建梵剎」，憲宗「賜額曰普照禪寺」。<sup>174</sup>而普照寺的住持，當時為藏僧孤納不囉口。<sup>175</sup>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傳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萬歷時著名文學家袁宏道往遊，「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豬手，肥而炷，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駢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思藏所供多此像」。<sup>176</sup>

其四，京城等地人不少也信奉藏傳佛教。他們有的投藏僧名下為行童，出家為僧（詳見前文）。有的向藏僧佈施。如，保定府新城縣韓堵社人張普旺，發心在房山縣小西天石經寺「佛殿四柱金諸佛一千五十四尊後，造石彌勒佛一尊，運本寺供養，亦助造銅佛一尊」。<sup>177</sup>適應民眾信奉藏傳佛教的需要，藏傳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暢銷，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後期，有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骷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碗並數珠，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京師「愚民競趨之」。<sup>178</sup>這些，也都是藏傳佛教在明代北京等地傳播和盛行一時的重要標誌。

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對藏區文化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明史》稱，憲宗「好番僧，至者日眾」。<sup>179</sup>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閉塞的藏區，來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於京師，服務於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需要。他們不僅自己增長了見識，拓寬了視野，許多人在回藏後也必然把漢地先進的文化、習俗介紹給藏區，加強了漢藏同胞的瞭解和文化交流。有關這方面的作用，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第四，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影響及於後朝，孝宗崇奉藏傳佛教與此有一定關係。憲宗去世後，其子孝宗繼位。因群臣力請，孝宗下令對京中藏僧皆降職、驅遣，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者五人，隨住者十人。<sup>180</sup>但是，由於長期身處宮中，受憲宗的影響，孝宗即位後也開始崇

<sup>174</sup> 釋道深撰（明），〈大明誥封圓修慈濟禪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42。

<sup>175</sup> 釋道深撰（明），〈五台淨戒禪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23。

<sup>176</sup> 袁宏道撰（明），《袁中郎全集》，卷 9〈崇國寺遊記〉，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版），頁 498。

<sup>177</sup> 佚名撰（明），〈張普旺造石彌勒像碣〉，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二冊，頁 101。

<sup>178</sup> 《明憲宗實錄》，卷 273，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頁 4601。

<sup>179</sup> 《明史》，卷 331〈西域傳三〉，頁 8578。

<sup>180</sup> 《明孝宗實錄》，卷 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頁 57。

奉藏傳佛教。一些藏僧，如鎖南堅參等遷延不去，孝宗許「留居京師大能仁寺」。<sup>181</sup>投孝宗之好，藏僧「多潛住京師，轉相招引」。<sup>182</sup>不久，孝宗對在京藏僧復加封授，先後陞藏僧割巴堅參、釋迦啞而塔、著乚領占、朵而只巴等為西天佛子。<sup>183</sup>孝宗的「恩澤」也及於去世的藏僧。弘治五年（1492）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贈為法王。<sup>184</sup>十四年十月，一西天佛子去世，追封為大智法王。<sup>185</sup>孝宗尤其崇信藏僧領占竹。領占竹，成化年間封為大濟法王，孝宗即位初「降為國師，斥令遠去」。<sup>186</sup>孝宗為所惑，弘治六年九月下令行取，「來居大慈恩寺」。<sup>187</sup>由於官員們反對，孝宗改令其「自備腳力來京」。<sup>188</sup>但官員們「論列不已」，十月「罷行取之命」。<sup>189</sup>至十五年四月，孝宗不顧反對，再次下令行取。<sup>190</sup>這些藏僧，正是憲宗當年的班底。宮中藏傳佛教法事，也一直沒有停息，「西天廠誦經供應太多，費財害民」。<sup>191</sup>新蓋清寧宮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頂國師那卜堅參等設壇，作慶贊事三日」。<sup>192</sup>在京中各寺，孝宗「啓建禳榮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sup>193</sup>當崇信的藏僧死，孝宗常賜葬費。如，西天佛子著乚領占死，賜葬；<sup>194</sup>灌頂國師班丹遠丹死，「命如著乚領占賜葬例，減半給予工價」。<sup>195</sup>總之，

<sup>181</sup> 《明孝宗實錄》，卷 22，弘治二年正月丙寅，頁 507。

<sup>182</sup> 《明孝宗實錄》，卷 48，弘治四年二月丁巳，頁 964。

<sup>183</sup> 《明孝宗實錄》，卷 108、卷 151、卷 182，弘治九年正月壬午、十二年六月丙辰、十四年十二月丁巳，頁 1975、2679、3351。

<sup>184</sup> 《明孝宗實錄》，卷 69，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頁 1314—1315。

<sup>185</sup> 李綸撰（明），〈敕賜西域寺重修碑銘〉，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三冊（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頁 108。按，該僧之名，因原碑文磨泐，難以分辨，追封之事亦未見實錄記載。《日下舊聞考》卷 96〈郊坰〉第 1609 頁有該碑文節略，亦無僧名。需要說明的是，景帝時，曾封班丹割釋為大智法王（詳見前文）。據陳楠著，〈大智法王考〉，載於《中國藏學》1996 年第 4 期（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1996 年 11 月），頁 68—83，班丹割釋生於洪武十年（1377 年）。僅從年壽判斷，弘治十四年（1501 年）去世而被追封為大智法王者不可能是班丹割釋。另，弘治年間封授的兩位法王，佐藤長著（日本），〈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いて〉，（載於日本《鷹陵史學》第 8 號）一文均未提及。

<sup>186</sup> 《明孝宗實錄》，卷 186，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頁 3434。

<sup>187</sup> 《明孝宗實錄》，卷 80，弘治六年九月己亥，頁 1522。

<sup>188</sup> 《明孝宗實錄》，卷 80，弘治六年九月癸卯，頁 1523。

<sup>189</sup> 《明孝宗實錄》，卷 81，弘治六年十月辛未，頁 1537。

<sup>190</sup> 《明孝宗實錄》，卷 186，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頁 3434。

<sup>191</sup> 《明孝宗實錄》，卷 46，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頁 927。

<sup>192</sup> 《明孝宗實錄》，卷 155，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頁 2778。

<sup>193</sup> 《明孝宗實錄》，卷 75，弘治六年五月癸酉，頁 1417。

<sup>194</sup> 《明孝宗實錄》，卷 182，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頁 3346。

<sup>195</sup> 《明孝宗實錄》，卷 182，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頁 3346。



無論是從性格的養成來說，還是從封授和供養的藏僧人員來說，均可看到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對孝宗的影響。

## 五、結語

明憲宗以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而著名。明憲宗極度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有：第一，在京大量封授、供養藏僧。其中，封授法王十三位，遠多於其他各朝。封授藏僧以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講經、覺義、都綱等名號則更為頻繁，成化後期往往一月數次，封授的人數也更多，常常一次數人至數十人。對在京藏僧，憲宗皆厚加供養。藏僧服食僭擬王者，錦衣玉食，最高達一千二百餘人。第二，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尤其迷戀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即房中術，經常召請藏僧入宮誦經行法，甚至憲宗之死都與之有關。第三，為藏僧建寺造塔，違制賞賜印信、誥敕等。成化年間，憲宗先後修建西山塔院、大隆善護國寺、真覺寺、大慈恩寺，並賜興教寺給大興法王結幹領占為「焚修之所」。藏僧鎖南領占、劄實巴、班卓兒藏卜等死，憲宗先後為建塔治葬。在京藏僧無地土可轄、政務可理，按制無印章之頒給，也不在賞賜誥敕之列。但憲宗崇信藏僧，往往違制給賜印章、誥敕。憲宗還給藏僧賞賜佃戶、土地等，免除藏僧寺田賦稅。第四，大量開度藏僧行童，縱容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成化年間所度藏僧行童及漢人習學藏傳佛教、出家為藏僧者，均超過此前各朝。憲宗對藏傳佛教的極度崇奉，雖然與武宗相比略遜一籌，但遠過於明朝其他諸帝。而對漢傳佛教，憲宗則並沒有顯露出太多的熱情，接觸的漢僧極少，漢僧得封授者微乎其微。可見，明憲宗極度崇奉的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

對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我們結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及修持特點，以及憲宗的個人性格、成化年間的朝政等，分析如下：第一，藏傳佛教宣揚「即身成佛」是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重要原因。藏傳佛教尤重密宗，密宗宣揚眾生根據宗教導師（喇嘛）的秘密傳授，通過設壇、供養、誦咒、灌頂等種種儀式，嚴格依法修行，通過三密加持，此身即可成佛。憲宗封授、崇信藏僧，

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無不反映他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接受，對即身成佛觀念的信持。第二，藏傳佛教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憲宗之所以極度崇奉藏傳佛教，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據說能夠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凶。而藏僧精於「秘密教」即房中術，滿足了明憲宗奢侈荒淫生活的需要。第三，藏傳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寶，是明憲宗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傳佛教宣揚喇嘛是救度眾生的宗教導師，提倡皈依四寶，竭盡財物供奉喇嘛。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因此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第四，宮廷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也對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產生一定影響。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從小在宮廷中成長的憲宗，耳聞目睹隨處可見的藏傳佛教佛像及其祖、父輩頻繁舉行的藏傳佛教法事，不時接觸入宮藏僧，並與受過藏傳佛教法事訓練的宦官朝夕相處，不能不受影響。第五，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還與其沉溺方術、喜好房中術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係。明憲宗政治上缺少了遠大志向和抱負，而在個人生活中則沉溺方術，追求長生，特別是喜好房中術。因此，他對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藏僧精通房中術的藏傳佛教極度崇奉。第六，明憲宗日益崇奉藏傳佛教也與成化年間朝政日趨黑暗腐朽、大臣們對其崇奉藏傳佛教的行為漸失諫諍和約束有很大關係。成化前期，朝多耆彥，大臣不斷地嚴厲勸諫和約束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因此憲宗對藏傳佛教的崇奉尚能克制。成化後期，朝中善類被驅斥殆盡，代以佞倖之臣的阿順和迎合，憲宗崇奉藏傳佛教更甚。

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給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帶來了很大影響。首先，憲宗大量封授藏傳佛教僧人，嚴重破壞了官員的選拔和陞用制度，造就了龐大的無補於國計民生的官員隊伍；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而對上朝聽政、出席經筵日講等卻多持消極態度，使明朝政治日趨黑暗腐朽。當然，憲宗也曾派一些在京藏僧為使，到藏區傳達朝廷政令，處理一些藏區事務，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這一積極作用頗為有限。其次，明憲宗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後的財政危

機。再次，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加強了漢藏文化交流。表現為：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等地，錦衣玉食，授徒傳戒，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為藏僧者眾多。其二，藏僧在京中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其三，京中出現了不少藏傳佛教寺院。其四，京城等地人不少也信奉藏傳佛教。適應民眾信奉藏傳佛教的需要，藏傳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暢銷，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對藏區文化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再次，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影響及於後朝，孝宗崇奉藏傳佛教與此有一定關係。無論是從性格的養成來說，還是從封授和供養的藏僧來說，均可看到明憲宗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對孝宗的影響。

綜上所述，研究明憲宗崇奉藏傳佛教，對揭示明代社會史、佛教史以及明憲宗的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鳴謝：感謝兩位審稿專家對拙稿的肯定和指正，感謝陳玉女教授惠寄資料。拙稿的修改，吸收了他們的審查意見，得到了他們的幫助。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

- 《明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本，1983年。
-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一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
- 王恕（明），《王端毅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五十一至六十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西藏研究編輯部，《明實錄藏族史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李迪等（清），雍正《甘肅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李賢等（明），《大明一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沈德符（明），《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于敏中（清），《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 俞汝楫（明），《禮部志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倪岳（明），《青溪漫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袁宏道（明），《袁中郎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商輅（明），《商文毅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張廷玉等（清），《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黃訓（明），《名臣經濟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葛寅亮（明），《金陵梵剎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趙翼（清），《陔餘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
- 劉侗、于奕正（明），《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劉若愚（明），《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儲大文（清），雍正《山西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釋明河（明），《補續高僧傳》，《高僧傳合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年。

釋鎮澄（明），《清涼山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

## 二、專著

丁漢儒、溫華等，《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年。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第一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0 年。

方志遠，《成化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伊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

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南炳文，《佛、道、秘密宗教與明代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年。

郭朋，《明清佛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台北：如聞出版社，2001 年。

間野淺龍（日本），《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79 年。

黃玉生等，《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黃春和，《藏傳佛像藝術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 年。

楊貴明、馬吉祥，《藏傳佛教高僧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鄧銳齡，《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 年。

姜立勳、富麗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釋印順，《印度之佛教》，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台北：正聞出版社，2000 年。

釋聖嚴，《西藏佛教史》，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 三、論文

何孝榮，〈明代佛教政策述論〉，載《文史》2004 年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11 月。

何孝榮，〈論明代的度僧〉，載《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4 年 2 月。

- 佐藤長（日本），〈明代チベッ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いて〉，載《東洋史研究》第21卷第3期、第22卷第2期、第4期，1962—1964年。鄧銳齡中譯文見《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第4期、1988年第4期，拉薩：西藏民族學院，1987—1988年。
- 佐藤長（日本），〈明廷におけるラマ教崇拜について〉，載日本《鷹陵史學》第8號，京都：佛教大學歷史研究所，1982年。
- 俞秋秋，〈高僧智光與北京的幾座寺廟〉，載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北京史苑》第2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6月。
- 馬建農，〈真覺寺〈明憲宗御制金剛寶座碑〉碑文考〉，載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北京史苑》第3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
- 陳玉女，〈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載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三號，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97年12月。
- 陳楠，〈大智法王考〉，載《中國藏學》1996年第4期，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1996年11月。
- 陳慶英，〈論明朝對藏傳佛教的管理〉，載《中國藏學》2000年第3期，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00年8月。
- 鄧銳齡，〈〈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載《中國藏學》1992年第3期，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1992年8月。
- 龍池清（日本），〈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團〉，載日本《佛教研究》第4卷第6號，東京：佛教研究會，1941年。

## **Study on Emperor Ming Xianzong's Worship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He, Xiao-Rong<sup>\*</sup>

### **Abstract**

Emperor Ming Xianzong was one of emperors who extremely believed in the Tibetan Buddhism during Ming Dynasty. He granted and supported the Tibetan Buddhists in Beijing, frequently held the Tibetan Buddhism ceremony. He especially was addicted to the so-called 「 Mi Mi Jiao 」. His exceeding worship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was related to the creed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also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conviction in the Palace and his pers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at time. His worship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conomy and culture during that period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into Beijing and internal areas.

### **Key words:**

Ming Xianzong; Tibetan Buddhism; religion ceremony

---

<sup>\*</sup> Associate Fellow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